

候无话不谈。起先，她在自己的办公桌清理出一个角落让我用。但是，有一个早晨她站在她的办公室外边说：“我没法让你进去了。大家都说你是一个线人。”骚扰折腾终于从上面下来了，谣言在我的同事们之间传播。这是最糟糕的事情。对外来的打击你还可以自卫，对造谣诽谤你就无能为力。在我的同事们眼中我正好成了那种我拒绝做的人。如果我做了那种线人，他们倒会毫不犹豫地信任我。实际上，他们惩罚我是因为我宽宥了他们。

因为现在我确实不得不证明我是来上班的，但是我没有办公室，因为我的朋友无法再让我进入她的房间，我就在楼道里站着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在楼梯里爬上爬下好几次，突然我又成了我母亲的孩子，因为我有一块手绢。我把手绢铺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一个台阶上，小心地把它铺平，然后坐在上面。我把厚厚的字典放在我的膝盖上，然后翻译那些液压机器的说明书。我成了个楼梯玩笑，我的办公室是一块手绢。午饭的时候我的朋友会到楼梯上来和我在一起。我们就像在她的办公室那样一起吃饭。过去我们是在我的办公室一起吃。我的朋友吃午饭的时候会对我哭。我不哭。我必须坚强。很长时间如此。几个永无休止的星期，直到我被开除。

在我成了个楼梯玩笑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在字典里翻查有关“楼梯”的词。第一级阶梯称为“入阶”，而最后一级阶梯成为“出阶”。阶梯上踏脚的平面则是夹在两旁的“阶颊”中间，而各个阶梯中间的空当就叫做“阶眼”。我早就熟悉与液压机润滑部分有关的那些漂亮字眼：“燕尾管”、“鹅颈管”、“喷嘴”，和螺丝结合使用的“螺母”

贴上“给奥斯卡的”，第二个星期再给他送去，就像我走出大门先是没有带一块手绢，现在我第二次走回来带了手绢。

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手绢结束的。

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叫马茨。上世纪 30 年代的时候他们把他送到提米苏拉去学习商业，这样他将来就能接管家里的谷物生意和杂货店。那个学校里有德国来的老师，是真正的纳粹。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训练，而更主要的是被培养成一个纳粹分子——按部就班地洗脑子。毕业的时候，马茨已经是个狂热的纳粹，成了另一个人。他狂呼反犹太人的口号，就像一个白痴让人不可理喻。我外公曾多次驳斥他，说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归功于犹太商人朋友预先提供的信贷。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，我外公也扇过马茨几个耳光。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理性已经完全被毁掉了。他在村子里做宣传，欺负那些拒绝去前线为纳粹卖命的人。马茨在罗马尼亚军队里本来有一份文职工作，但是他急于要把理论变成实践。他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，要求把他送到前线去。几个月之后他回村里来结婚，因为在前线见识到了战争的罪恶他多少变得聪明一点，他利用当时流行的骗人花招逃回来躲避战争。这个骗人花招就叫做：婚假。

我的外婆在抽屉最深处保存了两张她儿子马茨的照片：一张是婚照，一张是遗像。婚照上展示的是个全身穿白的新娘，比新郎还高一头，瘦削而严肃——长相真如麦当娜一个模子里出来的。在她头顶顶着一个蜡制的花冠，叶子看上去就像雪片做成的。她旁边是身穿纳粹军服的马茨，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丈夫，一个新

娘保镖而不是新郎。他回到前线不久，遗像很快就送到家里来了。它展示的是一个被地雷炸成碎片的士兵。遗像有手掌大小：在一块黑色田地的中间是一块白布，上面有一小堆灰色的人体残骸。衬托在黑色田地上的这块白布，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手绢那样微小，像是画在中间的设计奇怪的一个白色方块。对我外婆来说，这张照片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：在白色的手绢上是一个死亡的纳粹，在她的记忆中是一个活着的儿子。我外婆终其一生都把这张意义双重的照片夹在她的祈祷书里。她每天祈祷，她的祈祷一定也具有双重的意义。从一个可爱的儿子到一个狂热纳粹的分裂也很可能伴随在祈祷中，祈求上帝也能脚踩两头维持平衡，给儿子一份慈爱，给纳粹分子一份饶恕。

我外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士兵。他知道他提到儿子马茨的时候该说什么，他经常痛苦地说：“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，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。”这种警告也适用于我后来经历的那个时代。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。这是我决心不吹的军号。

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的确不得不违心地学过拉手风琴。因为在家里我们有一架红色的手风琴，本来属于死去的士兵马茨。手风琴的背带对我来说太长了。为了不让背带从我的肩膀上滑下去，我的手风琴老师就在我背上用一块手绢把它们系扎在一起。

我们是否可以，正好是最小的东西，不管它们是军号、手风琴，或是手绢，可以把生活中最不相干的东西联系在一起？这些东西如行

有一个清晨，在我快要离开罗马尼亚移居国外的時候，一个村里的警察来找我的母亲。她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想起来：“你带手绢了吗？”她没带。尽管警察很不耐烦，她还是到屋子里去拿一块手绢。在派出所里，这个警察朝她大发脾气。我母亲的罗马尼亚语不太好，不明白他叫喊什么。所以他离开了办公室还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了。我母亲坐在那里被关了一整天。最初几个小时她就坐在桌边哭泣。然后她走来走去，然后开始用她的眼泪浸湿的手绢给家具擦掉灰尘。后来，她又从墙角拿出水桶和墙上的钩子挂的毛巾来擦地板。后来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真是惊恐。我问她，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，帮他去打扫办公室？”母亲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她说：“我就找点事做，好打发时间。而且那个办公室那么脏。碰巧我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。”只有在那个时候，我才明白，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，她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。我尝试在一幅拼贴画里找到可以说明这种尊严的词语：

我想着在我心里昂扬的玫瑰

想着无用的灵魂像一个筛孔

但是拥有者询问着：

谁会得势占上风

我说：拯救你的面皮

他咆哮着：面皮

不过是块污迹糟蹋的绢布

这又不是绵羊。

这也不是人呀，他说。

他的手指冻僵了，只能缓慢地打开和关上那把剪刀。我不敢肯定，究竟是那把刀还是他的手发出刺耳的声音。我将刀扔到了雪地里。刀淹没了，根本看不到它究竟落到了哪里。他满院子地搜寻，鼻子上全是厚厚的雪花。我在院门旁边踩到他的手了，于是他耸起鼻子，但并没有走出院门外，到白茫茫的整条大街上搜寻。我说：

你该住手了吧，那只绵羊被冻死了，羊毛都被冻僵了。

院子的篱笆边上还有一棵绣球花树，上面的枝叶已经被剪得光秃秃的了。我朝那边一指：

那是怎么回事？

这是最糟的，他说，它春天就生孩子了，这可不行啊。

第二个晚上一过，保罗大清早就说：

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，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。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，这还早着呢。我们夜里应该一起睡觉。谁知道他做过什么梦呢，可他马上又会忘记得一干二净。

他说这是睡觉，不是做梦。今天凌晨四点半，我看到保罗在灰蒙蒙的光线下睡觉，一张脸走样了，还有一只双下巴。下面的商业大街上有人在骂骂咧咧，大清早地发出大笑声。莉莉曾经说过：

咒骂把恶鬼驱除。

戴草帽的老人快要下车的时候，用一双无神的眼睛朝我瞅了瞅。现在，有一个父亲抱着一个孩子坐在对面座位上，把自己的大腿放到了过道上。他不想与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城市景物有任何瓜葛。他的孩子将食指塞到父亲的鼻孔里。弯曲手指，寻找鼻屎，这是一个人早就学会的事。到了后来，人家会告诉他，一个人在自己的鼻子里寻找鼻屎，而且只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才可以这么做。对这位父亲来说，这个还不晚，他微笑着，或许这么做对他很有好处。有轨电车在一个不是车站的地方停了下来，驾驶员下车了。谁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停留多久。现在还是上午，他就在那段线路中间浪费了大家一段时间。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随心所欲地做点什么。他到那边的商店去了，还给自己的衬衫和裤子整理了一下，不让人看到他将有轨电车停在大路中央不闻不问了。他摆出一副架子来，好像纯粹是因为坐在长沙发上太无聊，出去溜达一下晒晒太阳而已。如果他想在商店里买点什么东西，他必须说出自己是谁，否则就必须排长队等候。如果他只是想喝咖啡的话，那但愿是站着喝。就算白酒那里开着窗口，他也是不允许喝的。除了他之外，坐在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有权闻一下白酒的芳香。可他装出完全相反的样子。因为我必须在十点整到达，关于白酒这件事，我倒和他处于同样的境地了。我倒宁可是因为他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才放弃购买白酒的。谁知道

面包店、蔬菜店、药房、酒吧、鞋店、理发店和幼儿园这八个前门身上。尽管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开了许多门，但许多送货车还是停泊在前面的大街上。

老鞋匠抱怨地方狭小，还有老鼠。店铺的工作台周围用木板钉住。

这个铺子是我的前任做的，当时是新搭建的，鞋匠说，木板墙当时也有。我的前任没想到，或者他没有兴趣去考虑，那些木板他并没有用过。我把钉子打了进去，自从鞋子挂到了鞋带儿、皮带或者高而尖的鞋后跟儿上面之后，就没什么要咬的了。老鼠咬，我得掏钱，这可不兴。尤其在冬天，因为饥饿在增长。木板后面的空间大得像大厅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有一次，那是一个节假日，我到店铺来，在下面的桌子后面松开了两块木板，用手电筒往里面一照。人是哪儿都进不去的，整个地板在颤动，发出吱吱尖叫，他说，全是老鼠窝。它们不需要门，只需要地上的过道就行。墙上到处都是插座，马路后面的建筑物墙上还开了许多后门，可以通往那些垃圾桶那儿。你都不用打开一条门缝宽，把老鼠赶出去至少需要几个小时。修理铺的门只是铁皮，商业大街后面的建筑墙上，超过一半的门都是固定在墙上的铁皮。人们想节省混凝土，而那些插座可能是给战事准备的吧。战争总是会有有的，他笑了起来，可不是在我们这里。俄国人和我们签订了协议，他们不会来。他们把需要的东西运到莫斯科，吃掉我们的粮食和我们的肉。他们把饥饿和棍棒留给我们。想要征

我的两只眼睛里。我目瞪口呆地睁大眼球，街道是最长的，树林是最高的，天空是最近的。我真希望没有尽头地开下去，不敢眯着眼睛。耳朵、手指和脚趾针扎般地发痛。寒冷战胜了一切，只有眼睛和嘴巴感觉是冷的。好运没有时间，我们必须在冻死之前到达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赶到服装厂大门口。保罗让我下车。我用一只红中带紫的手指将保罗的帽子推高，像吻瓷器狗一样吻他的额头，然后将帽子重新拉回到眉毛上面，于是他就继续骑车到市郊的摩托车厂去。他的眉毛上面有一层白霜，我想到：

现在我们老了。

纸条事件发生之后，我彻底底忘记了意大利的计划。人们无法通过出口服装得到马塞洛^[1]，人们需要关系、信使和经纪人，不是后裤兜。我有了那个少校，而不是一个意大利人。我的愚笨从内心深处向我吼叫，我的自责就像耳光一样，我的脑子里塞满了稻草。我讨厌自己，只有这样我才能每天继续和内罗一起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那些表格，并把它们填写完整，直至第二批便条出现。我仍然对自己好，只有这样我才会喜欢乘坐有轨电车，我把头发剪短，购置新衣服。我也感到很抱歉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分秒不差地准时出现在阿布面前。而且我也无所谓，我觉得，好像为了惩罚我的愚笨，

[1] Marcello，意大利人名。

对我们感到厌倦，但远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如此。不是所有的人都疯了，正如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被传讯一样。莉莉没有被传讯，尽管我的第一批纸条事发数周之后，我考虑到会有这一步。我想让她有所思想准备，在第一次审讯时那种微甜的味道会冲昏她的头脑。在第二次以及所有的审讯时也都一样，可人不再惊慌失措了。莉莉不害怕。

我可没有看到你的纸条啊。

好像这就是她不被传讯的理由。好像不是那些一无所知的人是最容易的牺牲品，除了面对恐惧，他们都会心跳加速之外。人的脑子里有了这种味道，就会马上签字画押。或许有人向内罗和包装车间里的那些姑娘打听过我的情况。内罗讨厌我，那些姑娘几乎不认识我，她们对我无所谓。我对她们也无所谓，可是，因为外面走廊上的门开了，她们话到嘴边没说出口的，绝不会是什么好话。

莉莉说得对，她从没有被传讯过。真是幸运，即便她应该为我辩护才是。她也完全无法保护自己。莉莉唯一一次向我打听过审讯的事，那句话是：

你的少校多大了？

你问得倒好，为什么是我的少校？我说。

我比他小十岁。

大约四十吧。

他一激动，他的皮肤就会撕碎了。

这种凄凉的孤独寂寞肯定不适合我。但我和内罗之间存在的，是一种背运，我在他的憎恨中摸索着行走。我和内罗出差到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一座小城，为期十天。他安排了这次旅行，可以选择想和谁一起去，然后推荐了我。出门几天，正合我意。在纽扣中心，正如该小城对该厂的称呼那样，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，不过更让我失望的是由十排一钱不值的房屋组成的不毛之地，被长满青草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基坑包围着，那里不再继续建造，也不再被清空。因为是国内最大的纽扣厂的缘故，那地方也不再被命名为乡村。三公里长弯弯曲曲的沥青马路，从宾馆一直通往工厂大门，中间经过荨麻地。风，黑绿色地一张一合，仿佛人们在游泳似的。每天清晨，我们在马路上溜达，这条马路时有时无。到了第九天，我差点儿也迷路了，荨麻地高过头顶。内罗不是第一次到这里，他就像熟悉纽扣厂一样熟悉这里的荨麻地。我们的鞋子被灰尘和露水弄脏了。到了八点，我们在大门口用内罗的手绢清洁鞋子，然后带着清单和织物图案在办公室和车间之间来来去去。下午五点，由塑料、珠光、兽角以及用两孔、三孔和四孔线制成的纽扣，还有带柄的包上亚麻布和丝线的纽扣，我都看花眼了。纽扣货源充足，就像制药厂里的药品一样。人们完全可以拿它们服用，比如每天饭后服用三次，装在盒子里，派送到药房，而不是送到需要缝制

好的机遇。我的手指一会儿在保罗下巴下面温暖的脖子上，一会儿在冷冷的啤酒瓶上。由于彼此之间了解不多，虽然谈了很多，但我们大多不是在谈论我们自己。保罗喝了六瓶啤酒，等到傍晚时分，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们来到林场，他还能继续喝下去。在居住小区里吃过午饭之后，他们想趁下周被关进工厂之前，还能将天空映入他们的脑海一会儿。一对中年夫妇戴着很粗的婚戒，戒指上面很时髦地刻上了花饰，他们在我们的桌旁占了两个空座位。

我最后一次问你，女人说。

我不知道，男人说。

那么是谁？

又不是我。

为什么不是你，谁也不会比你更笨。

别在说话的时候吐唾沫，上帝，我已经忘记了。

你早在出生的时候，就已经忘记你的理智了。

是啊，否则他就不会到你的小脑里了。

而是到你母亲的土房子里去了。

是你急需，我亲爱的。

你亲爱的，另外一个女人可不会要你。

哎呀，你还会为我哭泣吗？

你现在在想什么呢？